

關於漢語言文獻學研究的幾點設想

鄧聲國*

長期以來，我國的語言學研究，特別是語言的本體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與豐碩的研究成果，單從二十世紀而言，就出版了相當多的研究論著，發表了數以萬計的學術論文，從而極大地推動了語言各分支學科如語音學、語匯學、語義學、語法學、修辭學、文字學等的發展。隨著 21 世紀的到來，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持續、深入和拓展，語言學研究者的學術思想、學術理念，為適應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需要而變得日趨自由、新穎和進步，進而促進我國當代語言學的發展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延伸。如何在 20 世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努力尋找新的領域，採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適應新時代學術發展的需要，使得中國當代語言學的學術研究進入一種自覺、有序的發展狀態，這是擺在當代語言學研究者面前一個急需考慮和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近幾年來，無論是現代漢語還是古代漢語的研究者都注意到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漢語言文字本身的音、形、義等方面的研究都處在一個徘徊階段，研究觀念與研究方法、研究領域的創新力度不夠。因而，一些語言學者特別是現代漢語的研究者，將研究的視角關注於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引進，並將其理論與中國語言研究相結合，試圖走出一條可行的學術創新之路，以此使語言學研究擺脫當前的困境，重新走上輝煌。筆者近年來致力於漢語史的研究，且主要從事訓詁學的研究工作，深感當前訓詁學研究的困境與低迷狀態，同樣也一直思考著如何使傳統語言學的研究有所突破這一學術走向問題。要使學術研究取得一定的突破，可以從研究觀念與方法、研究領域等多方面進行創新，語言研究同樣如此。受近年來相關學科的研究走向的影響，筆者近幾年來思考的更多地集中在研究領域的突破方面，個人以為目前的語言學者除了繼續從事傳統意義上的研究內容的深挖掘外，必須加強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性學科建設，基於學術研究往往強調對所研究的專題研究動態的了解，要求掌握此前研究的結論、研究現狀與已有的實際文

*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生

獻成果，建構一門中國語言文獻學的設想就自然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當然，一門新興學科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學界同仁經過多次的討論與實踐的檢驗，然後付諸實現。本文擬就這一問題作一次初步探討，將筆者個人不成熟見解加以扼要的交代說明，以期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 建立漢語言文獻學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任何一門學科都需要有自己的文獻學，並通過自身學科的文獻學建構來促進自身的學術研究，當代漢語語言學的研究與發展同樣如此。只有充分利用和重視前人、同時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才能促進當前語言學的深入發展，否則只能是閉門造車，犯上黃季剛先生所稱說的「遼東白豕病」。誠如劉躍進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我們要了解前人和同時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恐怕還應該從積極方面著眼，也就是說，在前人和同時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探討哪些問題尚待進一步研究解決；哪些問題雖已有較一致的看法，而還有待於完善和深化，而且從這已有的結論中還可以聯繫哪些方面，進而解決另一些新的學術問題。這對於每個從事科研工作的人顯然是十分必要的。」¹ 我們提倡建立一門語言文獻學，並不是因為當前的語言研究缺乏對已有文獻的重視，而是因為回顧和總結過去可以更好地推動語言學的研究與促進學術視野的開闊，從檢討過去的學術研究中找出新的未知，並帶動相關的語言學教學與人才的培養。從這一角度來說，建立語言文獻學是十分必要的，是語言學研究人員理應肩負的一個重要使命。

我們注意到，一些強調應用的邊緣性或具交叉學科性質的語言學科正在興起，如交際語言學、文化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語料學、身態語言學、動作語言學、美學語言學、公關語言學、社會心理語言學、情報語言學、法律語言學、秘書語言學、民俗語言學、數理語言學、實驗心理語言學、幽默語言學、生活語言學、電視新聞語言學，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新型語言學科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豐富和完善了語言學的研究內容與研究思路，拓寬了語言學的研究與運用範疇，並使語言學具有了更多的讀者與對象。漢語言文獻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它與以上這些新興學科一樣，是一種時代的產物，是語言學與其他學科內容充分交融催生的結果。而這些新興學科興起本身就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立足現時代的語言研究現狀，進行語言文獻學的可行的，必要的，因為它是中國語言學深入發展的結果。

從中國文獻學自身的發展情況看，目前建構漢語言文獻學的條件、時機是成熟的，建立該學科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據我們所知，目前國內已經出現了許多專科文獻學

1 劉躍進：《中古文學文獻學·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版。

著作，如單淑卿、張春玲等著《中國經濟文獻學》，謝玉杰、王繼光等著《中國歷史文獻學》，張伯元著《法律文獻學》，等等，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積累了研究與撰寫專科文獻學的經驗。屬於中文學科的專科文獻學著作，也已經有了張君炎《中國文學文獻學》，劉躍進《中古文學文獻學》、孫立《中國文學批評文獻學》三部理論著作。張君炎、孫立兩位先生的著作都屬於通代性質，劉躍進先生的著作則屬於斷代性質，但都是中國文學研究與文獻學研究接軌的成功之作。漢語言文字學與中國文學一樣，依照現行學科體系，都是處於中國語言文學下的兩個平行的二級學科，比照以上這種專科學科建構情況，我們認為，目前提出建構中國語言文獻學是切合學術研究的實際的，正如古人所說的那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現階段學術自身發展潮流對當代語言學者提出的迫切要求與任務。

(二) 漢語言文獻學的學科性質與有關研究基本問題

中國語言文獻學是漢語言學與傳統文獻學學科知識交叉滲透、相互結合作用的產物，在某種程度上擔負著為當代語言學的具體研究實踐服務的職能，具有很強的理論性與學術前瞻性。具體而言，漢語言文獻學這門學科的學科性質，從目前文獻學的劃分情況來看，它屬於專科文獻學的範疇，漢語言文獻學的研究範圍應界定在漢語語言學與傳統文獻學、現代文獻學諸學科知識交會的地帶。事實上，漢語語言學的具體研究與應用實踐活動，無時不刻都受到文獻學知識的影響與制約，文獻學在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具有較高的影響因子，指導性很強。從目前所知的情況看，漢語言文獻學學科的建設要強調理論的先導性與學術研究的指導地位、指導作用，在進行學科理論的具體寫作中，須注意並加強這一方面的理論導向。除了具有很強的實踐指導性質以外，漢語言文獻學還具有綜合性質與實用性質。要使語言學研究者通過該學科的學習，能夠盡快掌握漢語言學研究各方面的大致現狀和學術前沿，並學會從已有文獻的研究中找出新質的東西，從而找到學術研究的突破口，解決語言研究的實際問題，解決語言學研究中一些新的疑點、難點問題，以期為實現中的漢語語言學研究提供一個學術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漢語言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是進行學科建構所要考慮的另一問題，因為這一問題的界定涉及到該學科的發展走向，影響這門學科的基本面貌。如上所述，漢語言文獻學離不開漢語言學本身，也離不開中國傳統文獻學。中國語言學研究在長時間的發展當中，積累、保存下來了相當豐富的第一手研究資料，它們自然就是我們漢語言文獻學研究的基本對象。由於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語言學研究基本上是從20世紀才開始的，因而早期的語言學文獻往往具有小學研究的性質，與經學研究密切相關。20世紀以後，語言學本身

的學科意識得到強化和突顯，出現了一批漢語語言學學科的理論著作，這些著作同樣屬於漢語言文獻學的研究對象。這些研究對象的載體形式，都屬於紙質文獻，20 世紀以前多為論著形式，而 20 世紀以來則在專著之外，發表了大量的單篇學術論文。和漢語言文字學研究者對文獻材料的運用相比，漢語言文獻學研究重在文獻載體，重在文獻整理方法上，或者可以認為，漢語言文獻學研究的資料是語言學內容的，但運用的方法是文獻學的。

關於漢語言文獻學的學科研究方法，必須考慮到它自身學科的交叉性和其他特殊性問題。我們以為，漢語言文獻學的研究方法應當以分析與整合為基本手段：所謂分析，是指面對一大堆語言學文獻材料，要求研究者善於充分利用漢語言研究的基本理論進行學科內容的分析，開展文獻本身的個案研究，找出各自的學術關聯和承繼之處，認清各自的理論創新或方法創新之所在。這一點是由語言學文獻本身的內容特質所決定的，它要求語言文獻學研究者具有嫺熟的語言學理論，要具有對反覆的文獻資料進行科學地分析與材料駕馭能力，並從中進行文獻學的分類整理與描述，達到條理化與明晰性的整理效果，離開了語言學知識和語言學研究手段，文獻學的價值就難以顯現出來。所謂整合能力，是指研究者面對豐富的語言學文獻，同時要跳出傳統的純語言分析觀念，學會運用傳統文獻學的文獻整理手段，如目錄、版本、校勘、注釋、編撰等方法，以及現代文獻學研究方法如縱橫綜合法、文獻調查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系統工程法等，重新設置具體研究方向與編排角度，實現學術內容的再整合，再創新。總之，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既要學會運用語言學理論、方法，又要敢於跳出語言學的學術構架方式，運用傳統文獻學和現代文獻學的整理研究手段，開展前瞻性的學術研究，使分析與綜合有機地融為一體，努力推動漢語言文獻學的研究深度和學科層次。

一門學科的發展成熟與否，是否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以及理論上是否具有先導性，主要取決於該學科是否具有一個完備的系統的學科體系，學科內容的安排是否合理可行。就漢語言文獻學學科理論建設的研究而言，它往往要涉及學科的研究對象及特徵，討論學科的名義問題，討論本學科的學科性質、與語言學、傳統文獻學、現代文獻學的關係與區別，以及學科本身的工作任務、工作性質與工作方面、工作方法；它還應根據本學科的文獻方法和工作方面進行分章列目，展開具體內容的討論與分析，抽繹出帶有普遍性與共性的各專題學科內容與學術論點；它還應對學科的學術史作出總結與評述，以及對本學科的發展前景作出可行性的預測與前瞻性展望研究，對今後的中國漢語言學研究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以便有利於促進漢語言學術研究的深入開展和完善。對於漢語言文獻學通論性著作的主體部分的安排和寫作，既不能完全採用一般文獻學著作按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編撰一類體例進行撰寫，也不能完全以一般語言學按語音、詞匯、語義、語法、修辭、文字一類條目進行撰寫，而應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找

準自身的學術研究點，而應兼顧文獻本身形式與內容兩個方面，合理地安排語言文獻學的各個工作方面。另外，各章節前後內容的安排，還必須在結構上具有系統性、理論性和科學性的特點，使前後各部分之間存在必然的邏輯聯繫與內在關係。限於篇幅，有關具體的學術體系問題，筆者將另行撰文予以論述和說明。總之，進行一部現代學科意義上的專科文獻學通論性著作的寫作，要討論關乎學科本身發展的各個方面內容，真正體現漢語言文獻學的指導功能與實踐功能，提供一個從事漢語言學學術研究的門徑，反映此前的語言學研究的基本情況，使讀者盡快搶佔學術研究的制高點。

(三) 漢語言文獻學的學科分支建設問題

由於漢語言文獻學是漢語言文字學與文獻學相互結合、相互滲透而出現的一門新學科，具有邊緣性、綜合性與交叉性的特點，因而我們可以根據本學科的特點和現實的學術需求對漢語言文獻學進行下位學科的劃分。有鑒於此，根據我國各級文獻學學科發展的歷史經驗、存在問題及前景與需要等多重因素的考慮，我們認為漢語言文獻學在下位學科的建設上，可以有以下幾種分類方式。

眾所周知，目前的漢語語言學屬於中文專業下的二級學科，其學術研究是由眾多具體的分支學科構成的。因而，我們首先可以根據現行的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劃分體系，在漢語言文獻學又可以下設訓詁學文獻學、傳統文字學文獻學、音韻學文獻學、古漢語語法文獻學等分支學科。現代漢語文獻學可以根據研究對象的區別，下設漢語音文獻學、漢字學文獻學、漢語詞匯學文獻學、現代漢語語法學文獻學、漢語語義文獻學、漢語修辭文獻學一類分支學科。邊緣漢語文獻學，是研究因廣泛運用現代漢語而催生的各類邊緣漢語語言學，如上面所提到的交際語言學、文化語言學、計算語言學、實驗心理語言學、幽默語言學、生活語言學、電視新聞語言學等交叉學科的學術論文論著，由此形成的分支學科，其下位學科又可以根據現已出現的邊緣學學科類別逐一劃分，無須多論。

如果不考慮目前古、今漢語研究學科的學科劃分情況，即從打破古、今漢語的界限出發，根據漢語言學研究人員研究對象的內容與性質角度不同，又可以在漢語言文獻學下設這樣幾個分支學科：專書語言文獻學、專題語言文獻學、專人語言文獻學、斷代語言文獻學。專書語言文獻學研究包括資料豐富的各種專書語言學術研究類文獻的有關學問，如尚書語言文獻學、詩經語言文獻學、春秋三傳語言文獻學、說文文獻學、爾雅文獻學、廣韻文獻學、變文語言文獻學，等等。專題語言文獻學研究有關漢語語言學中各類專題性文獻的有關學問，如語法專題文獻學、贛方言文獻學、修辭文獻學、計算語言文獻學、語用文獻學，等等，這一類學科分支與前面所講的現代漢語文獻學分支相比，更講究專題內容研究的通代性。專人語言文獻學研究對某一特定歷史人物作品的語言學

研究性文獻的有關學問，如鄭玄語言研究文獻學、王逸語言研究文獻學、高誘語言研究文獻學，等等。斷代語言文獻學則研究某一歷史朝代語言學文獻以及後來學者對這一歷史時期語言文獻的研究成果的有關學問，如漢代語言文獻學、清代語言文獻學、20世紀上半葉語言文獻學、20世紀語言文獻學，等等。

從以上漢語言文獻學學科分支情況可以看出，該學科的發展前景是非常廣泛的，目前如有可能，應組織有關專家進行論證，倘認為可行，可先行設立得到國家資助的研究中心，依托該中心進行人員的組織，以及學科建設的試驗，取得成熟經驗之後，再行大力推廣開來。

我們注意到，20世紀下半個世紀以來，一些語言學的研究已經帶有語言文獻的研究性質，如楊文全先生的《近百年的中國漢語語文辭書》² 就是這一類作品，但漢語言文獻學的學科意識，在學術界還比較薄弱，亟待加強。同時，該學科的理論建設才剛剛起步，我們對漢語言文獻學理論的認識也還很膚淺，還需要語言學界與文獻學界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和深入研究，使漢語言文獻學的作用在推動當前的漢語言研究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上面，我們對漢語言文獻學學科建設的有關基本問題進行了初步討論，從形式上看，大都屬於純理論的問題，而且有些問題還有待今後的深入研究，本文只是針對這一理論建構問題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以期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進而推動學科的全面發展。如有不當，尚祈方家指正為是。

2 楊文全：《近百年的中國漢語語文辭書》，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3月版。